



浙商大·金融学院学术文库

International Payment Imbalance
and Its Governance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全球化冲击下的 国际收支失衡与治理

——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

陈志昂◎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International Payment Imbalance
and Its Governance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全球化冲击下的 国际收支失衡与治理

——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

陈志昂◎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冲击下的国际收支失衡与治理——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陈志昂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136 - 2703 - 0

I. ①全… II. ①陈… III. ①国际收支—经济失衡—研究—世界 IV. ①F8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7133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赵静宜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马小宾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2703 - 0/F · 9573

定 价 49.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序 言

以 2007 年 3 月 13 日美国 New Century Financial 宣布濒临破产，道指大跌 2% 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发生至今已 6 年有余，但美国经济还处于微弱复苏过程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还遥遥无期，日本政府似乎也正以最后一搏的决心试图通过竞争性贬值解决长达 20 余年的经济衰退问题。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周期性危机相比，这次危机的长度可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比肩。无非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人类理性，均不是大萧条所处的时代可以比拟的。

当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的高逆差和东亚经济的高顺差，但其本质是全球性的供求失衡，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均是以债务支持当期消费，而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又填补了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缺口。当发达国家的债务难以持续时，供求缺口充分暴露，金融危机就是对全球性供求失衡的强迫调整。

我们是从 2003 年开始，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进入国际收支失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2003 年，对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可持续的讨论已经升温，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日趋强烈。在 10 年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从 3 个视角，即全球化、新兴国家、大国经济研究全球失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自 1992 年确定改革开放战略，2001 年加入 WTO，适应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第三次全球化的体制性要求，成为全球化红利的获得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从全球化视角研究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就意味着要以不对称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为前提，从全球资源配置角度，研究北—北、北—南和南—南经济体之间经济和金融的互

动关系，剖析市场体制全球性扩张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全球化与南北国家失衡之间的内在机理。我们得出全球收入分配失衡是导致全球供求失衡重要原因的结论，正是从劳动力全球化和流动性要素稀缺度提高这个视角展开分析的；从新兴国家视角，就是要从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国家的特殊国情出发，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研究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发达国家学者观察和研究全球失衡问题，大都从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出发，根据经典理论，诊断原因和提出对策，但往往缺乏对新兴国家特殊国情的了解。如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南方国家之间的供应竞争是导致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也从一个方面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大国经济的视角研究全球失衡问题，就是要认识到中国尽管是一个新兴国家，但却是一个占国际 1/5 人口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国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就必须考虑大国经济的政策反应和国际责任。我们在人民币区域货币锚的研究中，没有被发展中国家货币难以成为货币锚的传统观念束缚，得出了人民币可成为区域货币隐性锚的结论，提出了人民币应带动区域货币集体升值的政策建议。

本书从总体上反映了我们的研究历程和主要研究结论。第一章属总论性质，主要是分析全球失衡的机理，认为全球化使新兴国家二元经济转化为国际二元经济，劳动力全球化使流动性要素的稀缺性提高，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使全球生产效率提升，贸易品相对价格下降，新兴国家步入经济高速增长轨道，但也带来了全球性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发达和新兴国家的国际收支逆转，产生结构性失衡。第二章则从全球性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现象出发，综合全球供应竞争模型、劳资谈判模型和资源配置模型，主要探讨南方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机理，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开放扩大中国劳动力需求，但全球化冲击下，劳动力产出弹性扩大、地方政府之间的供应竞争、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均使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稳健性检验也显示，在全球化冲击下，中国劳动者获得的体制转轨红利以及人口红利相对较少。第三章则从劳动力全球化视角，通过统计数据的对比处理，比较南—北、南—南国家之间单位劳动成本与实际汇率的变化，寻找经济全球化对全球劳动

生产率、工资水平、劳动成本和实际汇率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对发达国家和相关竞争性国家这些数据的相对变化轨迹，其最重要的结论为：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均呈现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趋势，但新兴国家较发达国家下降的幅度更大。中国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工资增速的相对缓慢而大幅度下降了单位劳动成本，而其他竞争性国家则主要通过货币贬值和抑制劳动工资增长保持与中国竞争力的动态平衡。第四章则从实证角度，研究人民币汇率的贸易结构效应和全球化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通过中国与东亚四个竞争性国家对十个共同出口市场的研究，发现中国对竞争性国家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不但没有出现出口替代问题，还带来了贸易结构升级效应。同样，在进口结构上，也出现了人民币升值与国内进口替代效应加强，对机电产品的替代效应加强的效果；新兴国家不断增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中技术领先国的压力对发达国家中技术进步缓慢、结构调整呆滞国家形成了“夹层”效应，我们的研究也从这一角度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进行了论证。第五章以大国经济为前提，提出了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锚的可能性，并通过对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美元和日元与东亚货币高频数据的实证研究，证明东亚货币对人民币的趋同性更强。同时，根据大国经济的货币冲销能力强，小国货币冲销能力弱的假设，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也得出了当大国升值而小国不升值时，小国由于无法对付热钱流入不得不被动实际升值的结论，从而为人民币能带动区域货币集体升值提供了佐证。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我们提供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全球化视角下人民币汇率政策动态博弈》应急课题报告，其中有些内容一直没有发表。这一报告中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如对“新特里芬悖论”形成机理的研究，东亚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以低估汇率、提高储备保持宏观稳定的新重商主义假设、人民币汇率要保持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性均衡等，不仅奠定了我们现在的研究基础，也对当前全球失衡的解释和治理依然具有理论和政策意义。

本书的研究主要涉及问题的分析，对全球失衡治理的政策建议相对较弱。这一缺陷就我的能力而言是难以避免的。国际收支失衡的治理涉及北方国家之间，北—南国家和南—南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收入分配

政策的调节在传统上更是国内政策。但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日益联系在一起，单个国家的政策往往难以见效。如西方国家对高收入者提高了所得税率，但富人为了避税可改变国籍。为此，全球失衡的治理与其说是经济政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全球协调。

我们的研究只是一家之言，许多研究的结论还难以达到逻辑的完美和严谨，方法和数据处理上也存在缺陷。除本书内标示外，我的学生李鹤、章丽琼、胡贤龙、朱秋琪、江艳、卢一思、陈丽等参加了项目研究，对本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作为项目的负责人，我期待大家的批评，并对书中的错误负责。

陈志昂

2013年4月25日于杭州寓所

| 目 录 |

Contents

序言 / 1

第一章 劳动力全球化与全球供求失衡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全球化冲击与全球供求失衡	3
第三节 劳动力全球化与国际二元经济	10
第四节 要素配置矛盾与全球经济失衡	18
第五节 劳动力全球化与东亚经常项目顺差实证研究	24
第六节 总结与全球治理建议	32

第二章 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第一节 引言	34
第二节 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38
第三节 全球化收入分配效应的数值模拟	47
第四节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实证研究	52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启示	65

第三章 全球竞争视角下的北—南国家单位劳动成本变动与人民币汇率水平

第一节 引言	68
第二节 单位劳动成本与实际有效汇率	69
第三节 发达国家与东亚国家的实际汇率比较	73
第四节 东亚国家间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分析	77
第五节 中国与印度国际竞争力的相对变动	80
第六节 总结	83

第四章 全球竞争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

第一节 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的出口效应	84
第二节 经济增长和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96
第三节 全球化冲击下的“夹层效应”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107

第五章 东亚货币竞争性均衡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

第一节 引言	119
第二节 “货币锚”理论文献与东亚经济特点	120
第三节 东亚货币竞争性均衡的博弈分析	122
第四节 人民币汇率货币锚效应的实证研究	126
第五节 货币冲销能力与人民币区域货币锚效应	130
第六节 结论及建议	136

第六章 全球视角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第一节 引言	138
第二节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分析	139
第三节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水平	148
第四节 人民币均衡汇率	157
第五节 东亚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与人民币汇率的竞争性均衡	163
第六节 东亚各国与中国的劳动力平价分析	172

第七章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机理与人民币汇率政策动态博弈	
第一节 “特里芬悖论”及其现代形式	180
第二节 新“特里芬悖论”的形成机理	185
第三节 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中国家新重商主义	193
第四节 人民币汇率政策动态博弈	197
第五节 总结和政策建议	209
 参考文献	 216
重要术语索引表	239
 附录 1 工资决定方程	 244
附录 2 外包的收入分配效应	244
附件 3 对外直接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	246
附件 4 分三阶段拟合人民币系数及拟合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251

劳动力全球化与全球供求失衡

第一节 引言

次贷危机发生已经三年有余，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缓慢，经常账户失衡依然存在，并出现了重新向金融危机前回归的迹象。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无就业的增长，美国和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正在严重威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美国为刺激经济而实施的货币扩张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和通货膨胀，严重威胁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这次金融危机的恢复如此缓慢？这次金融危机究竟是一场仅由过度借贷而引起的危机，还是由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引起的危机？如果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究竟是什么动力和机制导致其失衡？

当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分析本次金融危机和全球失衡的原因时，可以发现一些发人深思的现象：一是本次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危机扩散程度最广、损害程度最深的一次危机，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性滞胀，80年代的以美日为代表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还是90年代的欧洲金融市场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均不能与这次危机相比。根据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1990）。从长期看，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经济危机的反映，是经济矛

盾的集中体现。基于这次危机是发生在国际经济核心体系，是核心国家的高负债和高对外赤字，其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已可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危机相比。无非当今的世界有政府的宏观调节，没有发生贸易保护和战争等非理性行为。因而，有理由认为，这次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供求危机，是全球生产效率提升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二是这次危机是全球经济核心国的危机，美、欧、日无不深陷于此，且调节的手段有限，至今看不到促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发达国家衰退的阴影，传统的核心和外围的影响机制正在发生逆转。这是否预示着全球经济地理结构的大变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转移到新兴国家？三是本次危机是在全球化冲击下，在新技术革命和自由化推动下，在微观效率改善下出现的宏观失衡。根据 IMF（2008）对全球化的回顾，1980—2007 年间，全球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重由 42.1% 上升到 62.1%，FDI 由 6.5% 上升到 2006 年的 31.8%，国际债权存量从占全球 GDP 的 10% 上升到 2006 年的 48%。IMF 认为，全球化扩展了市场，深化了国际分工，加强了市场竞争，推动了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显然，只要是适应全球化要求的国家，均能在全球化中受益。但是，全球化推进下的微观效率提升为何带来了全球失衡？

大量的文献均从投资和储蓄（Feldstein, 2011, 2008；Summers, 2004；Bernanke, 2005；Roubini and setser, 2004）、非对称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Dooley et al., 2003, 2004；陈志昂, 2005；华民, 2006；McKinnon, 2005；王道平和范小云, 2011）和汇率失调（Obstfeld and Rogoff, 2004；Dunaway et al., 2006；Goldstein et al., 2008）等角度对全球经济失衡和危机的形成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从本质上是一种效率导向体制，第三次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极大地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结构，导致了全球性的供求失衡。

本章从分析全球供求失衡的机理入手，基于二元经济理论，论证了在全球化冲击下，国际二元经济将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技术倾斜，造成需求难以适应供应能力的提升；劳动力全球化加深了流动性要素和非流动性

要素配置矛盾，跨国公司根据比较优势组织供应链，深化国际分工，必将导致全球的产业转移，劳动力全球化冲击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不可避免。本章也从实证角度对劳动力全球化冲击下的东亚顺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全球有效劳动力供给、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实际汇率和贸易条件、直接投资是上述变量中影响经常项目顺差的最主要因素。

第二节 全球化冲击与全球供求失衡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定理，如果市场体制能实现帕累托最优，那么市场体制就是有效的；同时，即使市场体制不能在微观上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但通过政府的收入转移分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市场体制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当通过政府的收入转移依然无法保证帕累托最优时，市场体制就无法保证其有效性。在一个具有民族国家的世界中，收入分配问题无论在逻辑还是在历史上，均属于国内政策问题。但是全球化本身就是突破民族国家的疆域，实现资源的全球有效配置，而由此引起的收入分配问题，又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在全球化冲击下，一些能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的国家获得了经济增长和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而不适应全球化要求的国家却在冲击中遭受福利损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无法保证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全球的实现。显然，要保证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不仅要经济增长基建在科技创新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上，更要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做蛋糕的效率固然重要，分配蛋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也必不可少。其一方面涉及供求平衡问题，另一方面涉及社会稳定。正如斯蒂格利茨（2004）所言，我们在拥有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时，很不幸却没有为各个国家人民负责的世界政府。缺乏国际协调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暴发出破坏性能量。

一、全球化冲击与供求失衡的机理

从历史的经验看，每一次全球化浪潮均是以效率提升下的全球供求失

衡为结局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动力源是以蒸汽机、电力和电话电报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由于既无国内的收入调节机制，更无国际的收入分配的协调，其巨大的生产率最终转化为全球性的供求失衡。世界银行（2003）的发展报告指出，1870—1934 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是以战争、全球经济危机、贸易保护和竞争性贬值，金本位制崩溃，并最终走向民族主义为结局的。同时，资本主义市场体制重新恢复活力，也正是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就是国家干预下的收入分配调节。1942 年，有人向罗斯福总统建议，鉴于美国经济已经恢复，应该恢复美国精神，重新回到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收入分配政策。罗斯福总统认为，由于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已经改变，回到大萧条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韦克特，2009）。与此同时，“二战”后的欧洲经济和社会体制也从战前的市场体制向社会市场体制转型。根据 IMF（2007）的统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发达国家劳动者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处于持续提高中，从 30 年代的 54% 上升到 68%。1950—1980 年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产生了“北方内部”体制和东方社会主义体制。“北方内部”体制在美国经济的带动下，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低收入工业化国家赶上了高收入国家。其收入分配的国际协调主要依赖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调节政策和世界银行的发展资助政策。但随着德国和日本等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日益显现，由于美国不能调节金平价，顺差国与逆差国在汇率调节上存在非对称性，其实质就是美国利用其铸币税特权，过度负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陷入了长达 10 年的全球经济滞涨。

第三次全球化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主导，以华盛顿共识为政策依据，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全球化，并以冷战的结束而扩展其边界。IMF（1997）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称作第三次全球化，并把全球化定义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实现世界范围的经济高度融合。Prakash and Hart（1999）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

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余永定,李向阳(2002)也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作为这一流动过程的终点,全球化意味着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达到了它的空间极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帕累托优化。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还主要限于发达国家和东亚的小国经济,那么90年代以来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则为全球化的突飞猛进扫平了道路,其突出的标志就是苏东体制突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华盛顿共识^①的形成。华盛顿共识的中心内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扫除一切民族障碍和国家干预,使商品、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力)在全球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制度创新,使原苏东国家、中国和印度两大人口大国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也使饱受80年代国际债务危机困扰的拉美国家在21世纪重回全球化的轨道。由此,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本国劳动人口向全球性劳动力供给转变。哈佛大学著名劳动经济学家Freeman(2006,2008)估计,中国、印度以及苏联集团加入世界经济,导致全球经济的劳工人数到2000年时增加了一倍,从14.6亿增加到29.2亿,并将这个过程称为“The Great Doubling”。结果是,资本/劳动力比率下降至原本数值的60%。

与经济自由化相对应,以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提高和生产社会化的迅速发展,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快捷、便利的现代化手段。科学技术特别是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缩短了世界各地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投资障碍,极大促进了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为全球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经济信息得以广泛传播、资本的跨国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作为世界范围内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体,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并由此形成的超国家的生产和营销网络,商品交易日益网络

^① 华盛顿共识可分为最初的和扩展的内容,参见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信出版社,2009。

化、全球化。由此，也加剧了要素配置的空间矛盾，为全球经济失衡埋下了病根。

第三次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卷入了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使国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压力传递到国际市场，其一方面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另一方面引起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70年代的高峰下降到2005年的62%左右（IMF，2007）。这种收入分配失衡在美国表现为中产阶级收入的下降，代表资本和技术要素的高收入阶层收入持续提高，消费层级牵引导致美国家庭部门过分举债，以借贷支撑的美国高消费既是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当前全球需求下降的主要威胁。在欧元区域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全球化冲击导致欧洲的竞争力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劳动者收入减少，政府为了维持政局稳定，政党为了获取选票，不惜大举借贷，而欧盟的体制性缺陷助长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本质上是对过度借贷支撑需求行为的调整，欧盟需求下降在一个中长期内是无可避免的。而在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全球化下的资本和技术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丰裕的劳动力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生产效率和供应能力，但二元经济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特征，各新兴国家为维持国际竞争力不惜采取低工资和低汇率政策等，又使工资被压在很低的水平上，劳动者收入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更严重的收入分配向资本、权力和技术要素倾斜的趋势。

在市场体制导向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根据王小鲁（2012）对不同口径的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1990年到2008年间降幅最小的为5.4%，从34.3%下降到28.9%。最大的为10.7%，从41.3%下降到30.6%。由于劳动者边际消费倾向高，而资本和技术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过多的储蓄一方面产生了更多的供应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房地产

等投机性需求膨胀，这种以外部和投资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外部需求不足的时候就难以为继，如何消化多余的产能已是当前的突出问题。

正是从以上的分析看，全球化激发了资本和技术在全球流动的动力，提高了市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全球的供应能力。但由于缺乏收入分配的调节，消费需求无法适应供应能力的提高，发达国家的借贷性消费和政府赤字支出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填补了需求的不足，但不具有持续性。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全球化冲击下的全球性供求失衡危机。

二、劳动力全球化的历史与度量

在市场要素的配置中，劳动力是最重要要素。无论资本和技术，没有劳动力的参与，就无法形成价值增值。第三次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东方体制的解体，中国与印度等人口大国融入全球化大潮。要理解全球化冲击和全球失衡的原因，就必须了解劳动力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

劳动力作为全球化的最重要维度之一，它的全球化过程也有着不同于其他要素的一些特点。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全球化是通过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来实现。Chiswick 和 Hatton (2001) 认为 19 世纪之前，涌向新世界的移民潮分为三个阶段：1600—1790 年以奴隶与合同工为主；1790—1850 年主要是自由拓荒者；1850—1920 年是大规模移民。当时从欧洲涌出的大规模移民主要去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阿根廷。1850 年到 1880 年间大约每年 30 万，1880 年到 1900 年年均 60 万，而从 1900 年到 1910 年的十年间，这个数字超过了 100 万/年。

由于大规模移民的输入（他们大多数为非熟练工），导致了移入地区的实际工资下降。受损的利益集团因此在民主体下通过游说向政府施压制定法律来限制移民的进入。19 世纪 90 年代各国纷纷开始了对移民的限制，这种限制在 20 世纪 20 年代达到了顶峰。尽管战后各国一度放松了对移民的限制，但这些放松往往是针对具有一定人力资本的熟练工而言的，而对非熟练工移民的限制仍然一直持续至今。时至今日，移民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绝对人口总数虽然已经与 1913 年之前的情况相当，但移